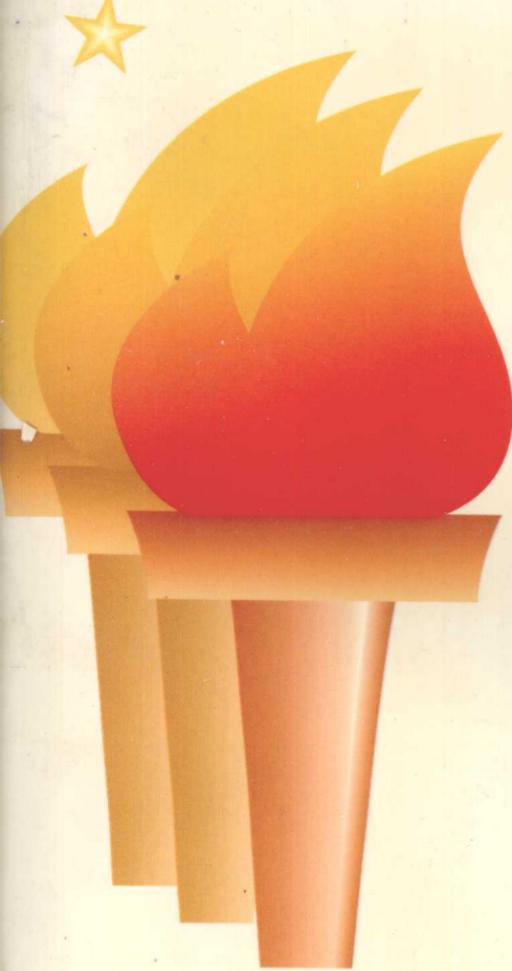


东北地区部分城市

党史论文集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东北地区部分城市

党史论文集

东北地区部分城市党史研究室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东北地区部分城市党史论文集
Dong Bei Di Qu Bu Fen Cheng Shi
Dang Shi Lun Wen Ji
东北地区部分城市党史研究室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4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25
印数:1—1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于 虹 版式设计:刘 畅
封面设计:李国盛 责任校对:周兆铮

ISBN 7-205-03825-1/D · 691
定价: 15.00 元

序 言

中共抚顺市委常务副书记 尹 文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75年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曲折前进和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如江河行地，若日月经天。

为纪念这个光辉的节日，东北地区部分城市党史工作者，于8月20日至22日，在抚顺市召开了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5周年”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上，许多专家、学者侧重我党75年历程中的重要领域、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展开深层次的探讨和研究。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长春、吉林、四平、大连、沈阳、鞍山、营口、锦州、抚顺等城市的党史工作者撰写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党史论文。经过认真筛选，编辑了这部39篇文章、20余万字的《东北地区部分城市党史论文集》。

这部论文集是在史料翔实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75年来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史程进行了科学的研讨，其表述、分析、评价也更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从内容上，作者以“九·一八”事变、红军长征、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党的“八大”以及本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专题，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开展中共党史和地方党史研究。从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

的基本特点，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成熟的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且为了人民利益的实现而不懈努力的党。应该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这部论文集的著述与出版，拓宽了中共党史研究和地方党史研究领域，深化了党史研究，充分体现了以史鉴今的社会功能。

概括地说，论文集以丰富的史料揭示了中国共产党 75 年的历史，通过对中共、地方党史中重大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史实的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而且集粹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 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关键时刻的思想和革命实践，是东北地区党史工作者心血的结晶，是一部地方党史的好教材。

1996 年 10 月

目 录

- “九·一八”事变与中华民族觉醒 刘建伟 (1)
试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转移 邓 颖 (9)
从“九·一八”事变看日本军国主义扩张野心
的膨胀 朱 芳 (14)
吉林“五七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及教训 田昌烈 (23)
长征起因之党的政治路线剖析 孟祥卫 (32)
长征——在逆境中探索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刘品荣 (38)
长征中的张闻天 王永君 (47)
从长征的胜利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性 张志卿 (57)
论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 刘 影 (66)
浅谈长征及其现实意义 庞纯杰 (74)
再论红军长征的历史地位 初 卓 (81)
试论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作用 王渤光 (90)
遵义会议实现中共集体领导问题述论 陈贵林 (100)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伟大作用 韩晓东 (107)
试论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 张 锦 (114)
论西安事变谈判的性质及其在国共谈判中的
地位和作用 郑 彬 (120)

- 试论东北军由内战向联共抗日的转变 吴庆禹 (127)
试论党的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光大 刘素英 (134)
“八大”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徐福仁 王春发 (142)
党的“八大”与“第二次革命”探析 王德利 (148)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八大”正确决策的重要贡献 张玉山 范征空 (156)
“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 三中全会路线得以贯彻的缘由与启示 宋文官 邹玉杰 (165)
试论党的“八大”路线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马翠丽 (17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八大”经济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傅利民 (181)
论“八大”的历史功绩 杨 林 (189)
党的“八大”以来党的建设问题的历史回顾 张 翔 (196)
抚顺地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述评 刘 畅 (205)
光辉的实践 成功的探索 王平鲁 (215)
略论我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形成及其理论贡献 于治臣 王 超 (229)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曹 扬 (239)
试论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调整的成功经验 崔贵海 (247)
党内反倾向斗争分析与思索 王宝铼 (255)
试论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沈济文 (264)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孙绳禄 (273)
浅谈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历史教训 王淑霞 (283)
建国以来党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王春发 (288)

- 反腐败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 周淑珍 (295)
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焦 阳 (302)
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孙凯旋 (311)

●刘建伟

“九·一八”事变 与中华民族觉醒

一、“九·一八”事变掀起了汹涌澎湃的 救国图存热潮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酷步骤。的确，从鸦片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前的近一个世纪里，无数中华儿女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篇章。然而，“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悲愤。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打进中国本土这个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矛盾地位，使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国兴家兴、国破家亡”，同仇敌忾，上下一心，中国社会各界参加抗战，海外侨胞和华人也参加到抗战的行列。中国的工人、农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

产阶级，在经过四年多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起来要求抗日。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1931年9月28日，上海、南京的学生几千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民族资产阶级这时也有明显变化，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上海、汉口、天津等地商号抵制日货，要求实现对日经济绝交。在被日军铁蹄占领下的东北，星罗棋布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除在中原大战后期调进关内7万人以外，仍有16.5万人驻在东北。但是，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坚持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南京政府采取这种态度，使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由于民族危机已到了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出现分化和破裂。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率先在全国从“九·一八”事变起坚持主张抗日，并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又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优秀儿女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潢、宁

安、汤原、海伦等游击队相继成立，抗日的烽火燃遍东北大地，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知识界，对时局的演变反应极为敏感，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各地学生运动怒潮澎湃遍及全国。这一运动直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地越出知识分子范围，走上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与革命武装相结合的道路，从而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日爱国滚滚洪流。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日寇的侵略使他们遭受的苦难最深，因而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最强烈。在全国抗日高潮中，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苦谏无策的情况下实行兵谏，逼蒋介石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不计与蒋介石的十年宿仇，坚持和平方针，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素以爱祖国爱家乡著称于世的海外侨胞，纷纷投入抗日的洪流，他们筹款募捐、抵制日货、购买作战物资，以各种形式和方式支援祖国抗战。

由此可见，当日寇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时，除了少数民族败类之外，整个中华民族意识、民族情绪、民族觉醒在华夏大地被唤醒，求同存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这是强敌不能亡我中华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以爱国主义为特征的可贵的民族魂。

二、“九·一八”事变吹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号角

中华民族酷爱和平，也最勇于反抗外敌侵略。当日寇侵入中华大地的危机时刻，无数仁人志士，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义无反顾，以身报国，浴血奋战，狠狠打击侵略者，把满腔热血洒在祖国的大地

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顽强拼搏精神。

中国抗日名将吉鸿昌，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成察绥抗日同盟军，任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同年9月同盟军失败。后在天津一带继续从事抗日活动，曾任天津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主任委员，并参与创办《民族战旗》杂志。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遇刺受伤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24日在北平牺牲。赵登禹在长城抗战中，亲自率领奋勇队夜袭喜峰口，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被国民党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佟麟阁1933年曾指挥第二十九路军参加长城喜峰口抗战。5月，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第一军军长兼代理察哈尔省主席。“七七”事变后，他与赵登禹坚决主张抗日。1937年7月28日率部队抗击进攻南苑的日军，激战中双双壮烈殉国。

最为壮烈的应是东北抗联的14年抗日斗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在总司令杨靖宇指挥下，驰骋在白山黑水之间，转战于茫茫林海之中，进出南满铁路，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向关内的入侵。杨靖宇壮烈殉国后，残暴的日寇割了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腹部，借以示众。面对杨靖宇的尸体，敌人骇然了，拖着他们在零下4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周旋转战的杨靖宇在牺牲前，胃里除了尚未消化的树皮、草根、棉絮外，竟然一颗粮食都没有。八路军副总司令左权将军，在反“扫荡”战斗中，临危受命，从容不迫地指挥战斗，为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出重围，自己却将一腔热血洒在太行山的十字岭上。许许多多不愿当亡国奴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在正面战场上也同日寇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的抗日英雄事迹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一同载入史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从来都是公正无私的。它既写下一个民族的耻辱，又记下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浩然正气。

“九·一八”事变之所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这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导致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及其国际反响；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一·二八”淞沪之战；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日本加紧吞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救亡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等，这一切都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国内阶级关系变动，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虽然东北已经进行了6年的抗战，但是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怎样在强敌入侵，国际绥靖主义盛行和国内战乱频仍的险恶情况下，逐步走向民族觉醒，团结抗日。在中国东方首先举起反侵略的旗帜，勇敢地迎击着第二号法西斯强国的进攻，抵挡着侵略战火的蔓延，并为亚洲及世界被侵略国家争取了宝贵的备战时间。这是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战阶段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使人难以忘怀，而且是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启迪与经验教训

第一，“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悲剧绝不允许重演。

日本帝国主义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到“八·一五”无条件投降，经历了14年的侵略历史。日本至今根本没有象样的“道歉”或“悔过”的表现，反映了日本不能坦率地承认历史、深刻反省并正确面对战争的罪责。在日本国内仍有一股极右势力，妄想重温军事政治霸权强国的黄粱美梦，竭力隐瞒歪曲和篡改过去的侵略历史。1995年正值世界各地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日本政界要人连续发表数起歪曲历史，推卸战争责任的谬论，归纳起来有三种论调。

其一，战争责任时效论。他们认为战争已经过去50多年了，战争责任已经是过时失效了，让日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承担战

争责任，在同亚洲各国的外交关系中，总以负罪者的姿态出现，有损于日本经济大国的形象。

其二，战争责任同罪论。他们认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欧美列强同日本一样，也是亚洲各国的侵略者，因此这场战争的胜者欧美同败者一丘之貉，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则是同罪的，为何只怪日本呢？

其三，相对主义的相互论。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安于落后的现状，虚度时光，才使日本走上侵略中国的道路。因此，中国对战争也有责任。正因为对侵略战争的种种无耻的强盗逻辑，导致日本修改教科书，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连篇累牍发表使亚洲邻国深感不安的言论。日本教授井上清说：“我们一定要把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两国人民，告诉两国的子孙后代。”

应该说我们最近几年对青少年进行的中国近代史教育是卓有成效的，然而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不看重自己国家历史的，不认真借鉴历史经验来为现实服务的，不运用历史事实教育后人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人生观、道德情操等的培养必须从青少年抓起，必须把青少年培养成为跨世纪的“四有”新人，牢记“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教训，防止过去的悲剧重演。

第二，“九·一八”事变伊始即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

“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是东北6年的抗战史，这既是一部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史，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开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在1931年就开始了。”然而，通常只讲中国抗日战争8年，却忽略了东北6年的抗战历史，这里掩盖着极其不协调的历史事实。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中国 14 年而中国抗战只有 8 年，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试问，如果说中国抗战只有 8 年，那么东三省人民浴血奋战，抗击日寇斗争 6 年，在历史上又如何记载？

东北 6 年抗战史，是通过联合作战狠狠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嚣张气焰的 6 年，是有力牵制日本侵略者迅速向关内扩张的 6 年。但是由于日寇的入侵，使东北 3000 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牵动着全国亿万人民的心。因此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战开端有着深刻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导致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开始，因而它制约和牵动着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和趋向，使抗日斗争成为全国瞩目的首要任务。“九·一八”事变后使中华民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促使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转折点。因此，“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地域性”的事变，而是震惊中外影响全局性的事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东北 6 年抗战史游离在全国抗战之外。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武装侵略，任何战争的爆发都有开始和结尾，这当然也包括现代战争都有爆发点。而爆发点、突发事变正是战争的起始。所以，“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开端。我们之所以坚持这一观点，是根据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得出结论。东三省党史工作者有责任、有能力、有道理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史实，给予恰如其分的理论阐述和有力说明，这正是今天纪念“九·一八”事变 65 周年的意义之所在。

第三，“九·一八”事变告诉人民落后就挨打。

历史雄辩地证明，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并步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而且长期处于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和内战之中。国家分裂，战祸连年，造成了中国军阀混战，各霸一方，加剧了中国四分五裂和贫穷落后，同时助长

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骄横跋扈，肆意侵略。

历史不能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东三省乃至全国人民造成沉重的灾难，诸如震惊中外的辽宁省抚顺平顶山大屠杀惨案，吉林省舒兰县老黑沟惨案，黑龙江省汤原县四合、长胜村惨案。特别令人发指的哈尔滨市 20 公里的平房，“731”部队灭绝人性的细菌实验，吉林省辽源煤矿“万人坑”，辽宁阜新煤矿“万人坑”、吉林丰满“万人坑”，那具具白骨，就是对日本侵略强盗有力揭露和无情的控诉。每一个炎黄子孙，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正义感的中国人无不切齿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空前的民族浩劫和国恨家仇，也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欠下的铁证如山的累累血债。

“知耻而后勇”，“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教训告诉人民：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曾以领先世界的发展与强盛而跻身于四大文明古国，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曾蹂躏、践踏过中华大地。因此，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是纪念“九·一八”事变 65 周年给我们最好的历史启迪。

当前，我们要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高举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牢记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教导，发展经济和科技，增强综合国力，才能顶住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压力，才能为制止新的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

● 邓 颖

试析“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它引起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本性变化，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铸成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中日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逐步实施 促使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开始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并确定了一条露骨的军国主义路线，把“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定为基本国策。这说明日本要用武力征服世界。为实现其目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竭力扩充军备。日本军国主义鼻祖山县有朋明确提出：“查兵之多寡，较诸国之贫富尤为当务之急”，“强兵为富国之本”。这就是说日本的“富国强兵”国策，就是一个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国策。日本军国主义按照“弱肉强食”的原则，根据它对力量对比的分